

海战奇迹的“诉说者”

——《张玉华将军海南岛战役工作笔记》

麦静月

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，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，每一件文物都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深刻的红色记忆，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。保护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，讲好红色故事，深化拓展革命文物教育功能，让红色文物活起来，红色基因才能更好地代代相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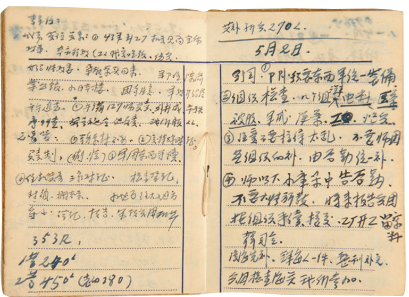
红色文物——热血沸腾的触碰
红色文物蕴含的精神力量承载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，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。每一件革命文物都凝聚着中国革命先烈伟大的遗志，其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。近年来，在海南省博物馆策划的红色主题展中有一件革命文物，它记录并见证了海南岛战役的全过程。这是一本袖珍的工作笔记本，其主人是时任第四野战军40军118师政委兼机帆船修造厂政委张玉华，他曾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，所在的师团创造了第一个加强(先锋)营和第一个加强团渡海成功登岛并以“木帆船战胜铁军舰”的战争史上的奇迹。小小的笔记本翔实记录了当年创造“木帆船战胜铁军舰”渡海作战的奇迹密码。笔记本里的文字既是解放海南岛的回忆，也是解放海南岛的见证，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筚路蓝缕、栉风沐雨的光荣历史。

红色记忆——把红旗插到天涯海角
1949年12月，随着中南大陆全部解放，国民党一部分残部逃到海南岛，以薛岳为总司令的海军防卫司令部在海口成立，并在包括琼州海峡在内的海南岛构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环岛海、陆、空立体防御体系——“伯陵防线”，企图凭海据守，将海南岛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。根据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，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十二兵团的40军和十五兵团的43军组成渡海作战兵团，肩负起解放海南岛的任务。

1950年初，韩先楚在40军召开的党委会上做出指示：“对部队要强调加紧做好战前准备工作，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3月完成。渡海登陆时间只能提前，不能拖延。”为了尽快解放海南岛，渡海作战兵团展开积极的战前准备工作，战士们以海为操场，以船为课堂，克服各种困难，苦练海上航行技术、登陆作战训练，这支来自东北英勇善战的“陆上猛虎”逐渐练就成南海“水上蛟龙”，“陆军海战队”就此诞生。同时，征集、修整、改装木帆船，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备战，在华南人民的大力支援下，由第40军118师352团组成的加强营，于1950年3月5日在雷州半岛西南徐闻县的灯楼角启航渡海，首渡天险的“木帆船”“土炮艇”，在有着“二十三年红旗不倒”精神的琼崖纵队的有力接应下，冲过敌人的飞机和军舰，于3月6日在海南岛西侧的儋县白马井成功登陆，“伯陵防线”首次被突破，第一次渡海成功登陆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。

随着第43军128师383团渡海先锋营和第40军118师、第43军127师两个加强团先后渡海成功登岛，打开了解放海南岛的胜利之路，人民解放军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。全面进攻的号角在1950年4月16日吹响，渡海作战兵团千帆竞渡继续突破围截强渡，勇猛登岛，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纵深挺进，经过10多天的激战，最终于5月1日解放海南岛全境。

海战密码——揭开海南历史新纪元
海南省博物馆馆藏《张玉华将军海南岛战役工作笔记》，长9.6厘米，宽6.6厘米，厚0.3厘米。该笔记本为中国广东生产，封面和封底均保存完好，脊背有破裂、脱皮，内页有些泛黄，共有31页，每一页都布满文字记录，有的字被水渍晕开已经模糊。



这本袖珍笔记本是张玉华在1950年3月至1950年5月(即海南岛战役渡海成功登岛)期间的工作记录，小小的工作笔记里记满了解放海南岛战役的“密码”，如今呈现在公众面前，笔记里亲切的字迹向我们讲述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，也为我们解锁了“小木船战胜铁军舰”渡海作战奇迹的密码。

笔记里记录了海南岛战役在准备工作中的许多具体事项，有渡海作战兵团团营级干部人员名单、韩先楚的作战指示，还有船只数量及分配、船只数据与改造技术攻关、人员待遇等。

1950年1月，张玉华由第40军第119师政治部主任调任至第118师师政治委员，笔记中记录了他抄录的所在第118师所有团营级干部的名册，有韩先楚对加强营营渡海成功登岛后，3月8日做的指示和4月2日军会议、4月4日师委大会内容，以及4月6日53团召开大会的内容与渡海作战指示。当时张玉华还兼任机帆船修造厂政委，因此笔记中也记录了机帆船修造厂的一些日常，如渡海船只的数量，各团船只分配情况具体到大船多少，小船多少、机帆船多少和舵手、水手、领航人数等，有改造船只工人的待遇、注意事项以及部分改装船的原始数据，如马力多大、油量多少、柴动时间、航速多少、航速多少等。此外，还翔实记录了渡海作战兵团开展的技术攻关，提高木帆船航海作战能力的细节：战士们将美式卡车的发动机拆下安装到木(船)上，船的速度就变快了。木船装了火炮就成了“土炮艇”，船上加强麻包工事，防撞能力就增强了等等。

张玉华将军留存的这本泛黄、老旧的工作笔记，让我们对解放海南岛战役期间第40军人员建制，为渡海作战兵团登岛而成立的机帆船修造厂赶修、改装木船和船只数量，具体到各团船只分配的数量、船的优缺点，装备情况等都有所了解，这也反映出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兵团克服重重困难，以简陋的装备战胜国民党军海陆空立体防御作战体系的英勇事迹。这个笔记本见证了渡海作战兵团在缺乏海军、空军掩护的情况下，以木帆船和少量机帆船为渡海作战工具，勇于向国民党军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“伯陵防线”发起进攻，“木船战胜现代化军舰”的奇迹，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，也揭开了海南历史发展的新纪元。

铭记历史——为振兴中华而奋斗
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，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。让历史说话，与历史对话，探究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，筑牢红色基因、传承红色基因、赓续红色血脉。解放海南岛战役距今已有70余载，战争的硝烟已飘散远去，这些保存完好、留存至今的革命文物蕴含着可贵的革命奋斗精神和历史价值，革命文物的故事引发观众共鸣，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。

(本文为海南省旅游文化广电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科学研究项目《博物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——红色展览策展人的责任担当研究》项目批准号：HNLW(YB)22-03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：海南省博物馆)

怀念朱家溆先生二三事

陈华莎

朱家溆先生学识渊博，风趣幽默，是我最尊敬的前辈之一。

和朱老真正熟识是在1990年之后。那时国家文物局决定在全国进行馆藏一级品的巡回鉴定，即在各省市文物部门已经认定的一级藏品基础上，组织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组成的专家组再次确认，最终结果进入国家档案。这一工作，从1991年开始持续至1999年基本结束，历时8年。当时专家组中有许多文物界的前辈，如北京市文物局的孙会元、苏州文物商店的张永昌等，朱老也是其中一位，而我是最年轻的，用杨伯达的话说，是儿童团。1991年春，河南省成为这项工作最先开展的试点，初期为综合组，各类文物大家一起看，然后各自发表意见。在河南境内，大家同坐在一辆面包车上，路况不太好，坎坷不平，颠簸时头部常常撞到车顶，但我们一路还是欢声笑语。朱老说，我们这是在周游列国。

从第二个省开始，为提高效率把一级品巡回分成了三个组。即陶瓷、青铜与玉杂，朱老在玉杂组。虽然这样工作加快了进度，但每个人看到的文物却少了。我私下和朱老说：“您老若看见什么好东西告诉我一声。”朱老答应，还笑对旁边的人说，华莎是个饕餮。果然，之后每逢玉杂组遇到稀有珍品，朱老总是派身边年轻同志来叫我，我就悄悄地站在他老身后过眼瘾，不明白的下来求教，朱老总是——告知，我把这些话都记在了笔记本上，一直珍藏着。

朱老的风趣幽默，寓教于乐，也时有发生。在某文物大省，一级品巡回组的领队是个刚刚毕业的研究生，小伙子高高的个子，英俊潇洒，年轻气盛。一次，一站看完，大家陆续上车，刚刚坐下，领队上来了，冲着老先生们喊：“人都到齐了吗？”大家默不作声。瞬间，没想到朱老站起来，双腿并拢，“啪”一个立正：“报告长官，人都到齐了。”全车人哄堂大笑。现在当年的小领队已是一方考古界的领导，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此事，此事是否会影响他人生的轨迹？

在巡回鉴定工作之余，有一天晚饭后组织大家去看演出。在剧场落座后，有人来告知：“省领导要接见你们。”此时没人站起，也没人吭声。来人再次问：“你们不想让领导接见吗？”朱老应答：“我们想看。”

朱老总戴着一顶折沿帽，而这顶帽子却经常被他在诸葛亮武侯祠或岳飞庙等处。当搭到帽子的同志赶来递上时，他就呵呵笑道：“这是天意，让我先贤致敬。”

朱老病重，我登门看望。朱老见我呵呵地说：“哟，华莎满面春风，我猜一定是有喜事儿告诉我吧。”记得那是朱老去世前一个多月时，相逢谈笑甚欢，毫无病容。当时我正要去远门，约定回来再来看望他老人家。记得那次是去古巴出差，我特意在当地买了好好的雪茄，准备回来送给朱老，没想到回来却只能祭拜在老人家的遗像前了。

如今我又到了朱老曾工作过的院落，不时能感到他的身影。春天梨花满枝头，我想朱老一定曾在树下抬头赏花吧。夏天中院摆满盆景，连启说，他曾和朱老一起为它们浇水。走过北房，朱老曾经的办公室，就想起有一次紫禁城出版社在南院卖打折的书，我闻讯来买了一大堆，一次拉不走就暂存在朱老办公室的外间，请他老人家帮我看管。他老乐呵呵地答应：“放心吧，我帮你看着。”现在已物是人非，但站在这里，我还常常能感受到朱老爽朗的笑声，慈祥的面容。

诗二首

刘家和

一
云淡风轻日，惠然旧雨来。
契阔谈讌际，相与乐花开。

二
群季皆俊秀，我生独不才。
秃发搔更短，忘事常须猜。

致敬刘家和先生

马自树

三月廿八日，荣声伉俪偕淑梅和我，由贤侄王晓驾车赴北京师范大学刘府看望家和先生。大学期间，先生教授我们世界史，印象深刻。先生治学严谨，学养深厚，对中外历史进行比较研究，著作等身，在学界有极高声誉。

先生年届九十有七，可称百岁老人，执教七十余载，桃李满天下。谈话中先生称我们为兄弟，其谦之风，令人感佩！在下不揣谫陋，献小诗四首，致敬先生。

一

鹤发童颜刘先生，
耳聪目明谈锋雄。
谦称吾儕为兄弟，
细说当年师生情。

二

坐拥书城百岁翁，
教学科研并峙隆。
著作等身通今古，
中外融汇立顶峰。

三

英人来访谆谆教，
赴美讲学谆谆家。
家有弟子千千万，
继往开来传火新。

四

学术大师不老翁，
史壇尽显开功伟。
丰碑矗立千秋在，
山高水长日月明。

二〇二四年三月三十日

题辞

彭卿云

好诗佳作，情意深浓。
百岁师长，文质双宏。
大师百岁，泰山可崇。

咸阳博物院藏汉代龙首提梁铜甗

李云

咸阳博物院藏有一汉代三足提梁筒形器(图1)，高17.8厘米，口径11.9厘米。据博物院文物台账记录采集于咸阳市教师进修学校(现为咸阳师范学院)，位于今天陕西咸阳文林路上的咸阳师范学院东侧。器身圆直筒形，子口，盖。腹和底沿有一道宽凸弦纹。器身两侧有耳，耳上有环，通过两个“8”字形环扣连接提梁，提梁两端为龙首，底部有三只小蹄形足。

类似形制的器物在多地发掘出土，有陶器和青铜器。考古工作者曾一度对这类器物有不同的命名，有提梁缶、提梁樽、酒樽、提梁盃、奩形器、三足提梁筒形器等。咸阳博物院收藏的这件筒形器形制虽与直筒形温酒樽类似，但更瘦高，与矮胖的温酒樽区别明显；与奩类似，但奩多为敛口圆腹圈足，直筒形直筒数量较少，且出土的直筒形均为平底无足，纹饰繁复，高度一般超过33厘米，口径超过13厘米，明显大于咸阳博物院收藏的这件筒形器；此外，周人禁酒，西周开始，酒器的数量大量减少，取而代之的则是食器；而奩是放置化妆用品的器具，器型也为矮胖形，从功用和形制上都与咸阳博物院收藏的这件筒形器大相径庭。综上所述，这件筒形器是不同于奩、樽、盃的另外一种器具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23年8月22日入藏一件类似的筒形器，器身刻铭文自称为铜甗：“河平元年供工昌造铜甗，容二斗，重十四斤四两，护武，盖夫昌主，右丞谭，令谭省。”由此推断，咸阳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三足提梁筒形器为“甗”。

《说文·金部》：“甗，温器也，圆直上。”“圆直上”正是这种筒形器形制上的主要特点。咸阳马泉西汉墓也出土了一件铜甗，器内有“有液体凝固痕迹”；辽宁抚顺刘尔屯西汉墓出土的一件铜甗“内盛禽骨”；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一件铜甗其内盛有鸡骨和汤羹，说明甗很可能是盛放汤羹的保温器具。铜甗体积小，提梁便于提取和移动，子母口盖子可防止汤羹外洒，小口径、深腹、三足将器底悬空，有利于保温。它与我们今天的保温桶功能类似。

宁夏固原县一处沟崖出土的铜甗，与咸阳博物院这件铜甗形制相同。考古工作者依据一同出土的其他器物，将其定为秦代器物。甘肃镇原县博物馆藏有一件秦代提梁缶(图2)，其提梁与咸阳博物院藏的这件铜甗提梁相同。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铜甗(图3)，其上的蟠螭纹为典型的战国纹饰。所以，这种龙首提梁铜甗有可能最早出现于秦代，汉代开始流行。



秦汉时期的铜甗，形制上无太大区别，大部分通高17.6至28.8厘米，口径10.5至14厘米，直筒形，子母口，带盖，盖上有纽连环，带龙首提梁或无龙首的提梁，腰饰凸弦纹，三蹄足。

缶和甗或许存在着演变关系，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甗被称为缶的原因之一。在形制上从圆腹演变直筒，在功能上从酒器演变食器。西周部分青铜缶(图4)在提梁上装饰有牛头，牛头在提梁缶上的位置与龙首在提梁铜甗上的位置相同，由此可以大致推测从西周青铜缶到秦代龙首提梁铜甗，再到龙首提梁铜甗的演变过程。

秦人崇尚水德，因此秦人在很多器物上融入了龙的形象，汉代将龙的形象进一步发展，用于玉佩、玉璧、铜镜、砖瓦、画像石等。龙的形象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，并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精神载体和一脉相承的文化符号。

科技保护
环境监控、本体监测、预警评估

科学管理
资产管理、人员管理、咨询服务

创新服务
科技文创、定位导览、数字化采集

遗址
博物馆
发掘现场
档案馆
图书馆
旅游景区

MicroWise System
元智系统
西安元智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MicroWise System Co., Ltd.

联系人：姜磊 13572270596
座机：029-88346362
官网：www.microwise-system.com
邮箱：info@microwise-system.com

博物馆里的九龙灯

钟平 钟阳春

龙者，神物也，龙乃中华之图腾，吾辈皆为龙子龙孙也。作为龙的传人，要有龙的精神，龙的气魄，在吉安市博物馆里有一盏照亮人精神的九龙灯。

九龙灯是吉安独具地方特色的一种古灯，由龙、宝剑和书箱组成，在龙形的支架上错落有致地放置着九盏清油灯，中间竖着一把宝剑，直插底座书箱，龙象征兴旺发达，宝剑素有君子之德，而书箱则是知识的象征，寓意“书剑安邦，文韬武略”。九龙灯旧时多为书院、祠堂中之灯具，灯者，火也；火者，光也；灯亮处，光明也。这盏吉安百姓心中的神灯，见证着自古以来庐陵大地上耕读传家、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。

吉安古称庐陵、吉州。秦统一中国，分三十六郡而治，庐陵县列其一。三国时升县为郡，隋至宋代改称吉州，元代称吉安路，明、清两朝称吉安府，现为设区市。

千百年来，庐陵一直是江西中部重镇，素有“江南望郡”“金庐陵”“文章节义之邦”“理学之邦”的美誉，流传着“一门三进士，隔河两宰相，五里三状元，十里九布政，九子十知州”的民谣，“况状元，第宰相”“父进士，子翰林”“三代同科”“兄弟连科”等科举佳话世代相传。历史上有欧阳修、周必大、杨士奇、杨万里、文天祥、邓光荐、刘辰翁、罗泌、解缙、邹守益、罗洪先、罗钦顺、刘绎、彭时、彭华、陈嘉謩等历史文化名人和胡铨、杨邦义、欧阳珣、刘球、周天骥等忠君爱国的志士仁人。从唐朝开科取士以来，先后涌现了17位状元、16位榜眼、16位探花、3000名进士(仅明朝一代的进士就近千人)，明建文二年(1400)和永乐二年(1404)襄扬鼎甲，因而明朝一代有“无庐陵不成衙门”之说。

此外，禅宗七祖行思在青原山开辟道场，武功山、玉笥山、南山清水岩为道教圣地，儒释道三味濡沫，千年相延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。凭借我国南北黄金水运的大动脉赣江之滨的地理位置，杜审言、颜真卿、程颢、程颐、苏轼、黄庭坚、辛弃疾、江万里、王阳明、施润章等文化名人，或缩铜章而为官讲学，或挟东箭而游历庐陵。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的足迹遍布庐陵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，谱写了灿烂的庐陵文化。

庐陵文化是宋明以来在古庐陵郡范围内出现的，地域



清代九龙灯
吉安博物馆藏

特色鲜明。它以越楚文化为源头，以农耕文化为基础，经与中原文化长期融合，形成了以阐扬理学为主导，崇尚诗书，遵循礼教，文章节义并重的特质，并且渗透在诸多领域，已经深深植根于百姓心中，化为社会生活习俗。其内涵博大精深，其精神刚正义烈，其地位独树一帜，历来倍受专家学者推崇。有史学家指出，研究东方历史文化离不开中国和印度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重在唐、宋、明，研究宋、明历史文化离不开庐陵。

2022年，吉安市政府坚持“文化振兴、城市更新、旅游出新”，打造后河·梦回庐陵景区项目，以“梦回庐陵”为主题，以桥为引，以船为媒，以“沉浸式光影夜游”为主线，将后河打造成为一条梦幻的庐陵文化长河，让游客“船行诗画里，梦游两千年”。景区匠心还原庐陵盛世，萃取了庐陵文化精髓，借助多种高科技光影手段，将庐陵文化融入实景演艺，设置了“九鲤化龙”“大唐歌飞”“山水诗境”“十七状元”“节义文章”“朗朗书声”“雨过天晴”“凤舞庐陵”八大光影场景，讲述自先秦、唐宋、明清再到现代吉安的动人故事，旨在打造出5.5公里的沉浸式文化夜游体验，呈现一场富有创意和视觉冲击力的光影盛宴。景区融入吉安市中心城区生态休闲旅游圈、大井冈旅游圈，成为展示庐陵文化的“活”历史图、旅游资源集聚的文化旅游区、市民观光休闲的生态休闲区，让庐陵文化动起来、活起来，看得见、摸得着，焕发庐陵文化新光彩。

与此同时，在后河景区的中心位置规划设计，把九龙灯以艺术再造之形式，使其走出博物馆，成为庐陵新文化地标，在吉安后河景区的爱琴岛上龙头高昂。

艺术造型的九龙灯气宇轩昂，通体用非遗技艺篆刻手法，全紫铜打造，剑首、剑柄、剑身以及书箱底座参考古青铜器纹饰，采用全身纹饰，尽显江南青铜王国特色。它高33.17米，其间之用意：第一个“3”指吉安有3000名进士，第二个“3”指吉安有300座书院，而“17”则指吉安有17个状元；基座高4.7米，寓意吉安历史上殿试三甲47人。龙头向东偏北，对应着文昌星位，表达了文教昌盛又兼具紫气东来、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；九灯煌煌，象征着庐陵子弟志存高远，节节登高，也寓意庐陵子弟家国情怀，开放争先。吉安人承载着典雅高贵的庐陵古风、刚正义烈的气节丹心，依然是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的中流砥柱。